

华阳国志

南中志校注稿

〔晋〕常璩撰
缪鸾和校注

云南大学
西南古籍研究所印行

华阳国志·南中志校注稿

〔晋〕常璩撰
缪鸾和校注

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印行

记缪鸾和同志及其遗著

李 埏

缪鸾和同志于一九七九年六月辞世，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八年的岁月，不可谓不长。但鸾和的音容，一回想，犹宛在目前。他在病榻上，多次向我细说，待病愈后，他要研究什么课题，写什么著作，开什么课……哪知言犹未了，他便和我们永别了！

鸾和与我结识是一九三九年的初秋。那时他是云南大学文史系刚升入二年级的学生，我是西南联大历史系刚升入四年级的学生。他在一年级时选读吴晗教授的《明史》课。一天，吴先生对我说：“云大文史系有个学生叫缪鸾和，很不错，好学用功，成绩为全班之冠。我们‘中国史研究会’不久要在昆明举行年会，我打算介绍你和他入会。”我听了，十分兴奋。这个会，我在北平时便闻名了，知道是清华、北大的一些年轻的史学家组织的。其中以张荫麟、吴晗、夏鼐、罗尔纲、邵循正、孙毓棠……最为知名。现在我和鸾和两个尚未卒业的大学生，竟能侧身于这些史学家之林，我感到何等荣幸！他是不是也同然？他是何许人我还不知道。我很想认识他，于是我请一位云大友人为我探询他的住处，打算去拜访他。哪知，友人尚未回话，他却在一个星期天的大清早到胜因寺联大宿舍看我来了。原来他听说我要去看他，

便“先施之”赶早而来。觐面后，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循循规矩，彬彬有礼，讷于言法，似乎有点儿颀颀和拘束。可是话题一转入读书为学，他便滔滔不绝地谈起来。我惊讶，他的学殖是那么深厚，思维是那么细密，论述是那么通达。无怪乎得到吴晗先生的器重和嘉许，确实是我辈中的翘楚。从此，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大约是一九四〇年初秋的一天，鸾和从昆明城里徒步到龙头村宝台山上去找我（那时，我就读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随所疏散住山上观音寺）。他为什么去找我呢？原来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特地去告诉我，并征求我的意见。他的决策是，经过两年的学习和思考，他觉得还是以滇史研究作为毕生治史的努力方向好。想来想去，总觉得自己的根柢和爱好在于滇史，决计为之尽毕生之力。又说，滇史研究虽然有许多前修导夫先路，但筚路蓝缕之功仍须继续，首先是古籍的整理。滇史载籍既少，又多讹误。若不亟加校勘考订，势难深入研究。当然这工作很艰难、枯燥，被人视为“笨功夫”，没有决心和毅力是不能做的。他为此反复考虑，最后决计“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由此踏上治滇史的道路。我问他从何着手。他说，打算先搞《华阳国志》。我认为《华阳国志》分量多难度大，非短期所能完成。而且他还要作大学毕业论文，近期恐难兼顾。他说以之作为毕业论文。俟将来毕业之后，再进而次第作其他部分。那天，天气晴和。午饭刚毕，我们俩便沿着金汁堤，逆流上溯，步行到松花坝。大部时间谈的都是与上述有关的话。边走边谈，直到薄暮才回到宝台山。

我很赞赏他的志气和设想。我觉得他的性格特点是运思邃密，而果断少嫌不足。因此，我一再鼓励他莫再犹豫，就这样定下来。我相信，以他的聪敏才智和刻苦努力，只要干下去，必有很可观的成就。他的父亲缪果章（字浒澄）先生是云南宣威县的绩学之士，深谙云南掌故，所修《宣威县志》为民国云南诸县志之冠。他的叔父缪尔纾先生执教昆明，为滇中知名学者，亦深于滇南旧史。鸾和自幼受父叔的熏陶，孜孜好学，博闻强记，在中学时即已为师友所重。入大学，值抗日战争爆发，学者云集昆明，因得亲炙吴晗、钱穆、方国瑜、徐嘉瑞、向达、顾颉刚、楚图南、姜寅清……诸先生，于是学业大进，日新月异，敢于以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问津《南中志》的校注工作。

那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城中办事处在青云街靛花巷三号。其中有一个角楼设床二张，专供研究生入城住宿之用。但常无虚席，所以我每进城总是到云大鸾和处借宿。我看到，不论是祁寒暑雨，也不论是节日假期，他都一心专注在《南中志》的校注工作上，毫不外鹜。云大图书馆藏书不足，他便到昆华图书馆或其他图书馆去借阅。方国瑜先生长于史料学，专事云南史料的蒐集与整理。他便请方先生做他的指导教师。两年之间，他翻阅了许多书，写了许多笔记和卡片。用力之勤，朋侪中实少有其比。到一九四二年暮春，他的《南中志校注稿》脱稿了。对人很少许可的方国瑜先生阅后，也不禁大为嘉许，评为最佳成绩。云大文史系主任徐嘉瑞先生曾有意为之刊印，但限于经费未能实现。此后便被束之高阁达四十余年之久。直到现在，尤中同志主持云大古

籍研究所工作並主编《西南古籍研究》杂志，乃从故纸堆中取出付梓问世。惜乎鸾和墓木已拱，不及见了！

鸾和的《南中志校注稿》虽然是他青年时代的处女作（成稿时才二十六岁），但是，即以今天的标准去评价，也自有其可供参考的价值。尤中同志指出：“《南中志校注稿》一书，征引宏博，讎校精审。既纠正了传本中文字的讹脱舛误；又系统化了汉、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史料。这就对西南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我是鸾和校注《南中志》的见证人，也是他这部书稿的第一个读者。（在那两年里，每十天半月我必从龙头村进城一次。每进城必和他相见，每相见必谈他的校注工作。他还常常让我读他已写成的稿子，要我和他辩难讨论。）凭我的记忆和我之所知，我认为尤中同志对这书的评论是客观的，允当的，所以引录如上。在这部书稿刊印的过程中，尤中同志而外，还有几位同志积极给以襄助：何耀华同志（云大科研处处长）大力支持，杨寿川同志（本刊副主编）建议付印，郑志惠同志抄缮全稿。我作为鸾和的挚友，对上列同志的热情高谊表示十分感谢！

一九四二年七月，鸾和毕业了。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文史系助教，兼在西南文化研究室工作。嘉瑞先生对他颇为倚重，除让他任两班“大一国文”课外，还委任系务（相当于现在的系秘书）。同时，求实中学校长苏鸿纲先生早就约他任教。鸿纲先生是年高德劭的长者，他不能违命，只得去兼了一个班的历史和国文。鸾和一生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现在他既要搞好系务，又要教好课程，自然更无余暇

做别的工作。他曾多次对我说过，等大学毕业后要赓续校注《华阳国志》。这哪里还有时间呢。

一九四五年，鸾和升任讲师。新学年刚开始，嘉瑞先生通知他和我说：熊庆来校长要约我们二人谈话。我们按时到校长办公室，嘉瑞先生已在。熊校长说，他和法国里昂大学已商定互换研究生。云大方面决定，文科派我们二人去。嘱我们即作准备，学习法文和西洋历史。我们听了很兴奋，立即寻师学法文。经人介绍，得就教于孔令忠神甫。孔神甫很热情，很认真。课本用邵可侣编的北大教材《大学初级法文》，进度较快，而鸾和的外语基础又较差，所以相当吃力。但他以“人一己十”的毅力，刻苦攻读，按时背诵、作练习。这样一来，校注工作就更无从提起了。读了两年，赴法之事成泡影。我们也就不再作出国之想了。

这时候，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进军已显露出行将到来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它使每个中国青年不能不思考：祖国、民族将往何处去；自己的人生道路将如何选择。鸾和是一个敏感而好学深思的青年。他想得更多、更深、更远。有一段时间，他好象有些徬徨。正在那时，文史系新聘来一位青年教师——马曜。不久，马曜同志的学识和才华，尤其是他的进步思想，感染了我们。我们常常去请教他，从他那里借阅一些进步书刊，受到很大启发。鸾和的觉悟比我快，进步比我大。过了些时，他索性走下讲坛，加入进步学生的行列，和他们一起斗争。因此，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九九整肃”时曾受到学校当局的“警告”。但他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快前进的步伐，加入了地下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

者联盟”。解放后，当昆明保卫战最危急时，他毅然响应号召，加入临时组织的人民自卫武装，荷枪实弹，坚守在玉龙堆的街垒岗位上，通宵达旦。

解放前的这段时间是鸾和一生中的转折阶段。以前，他一心只想做一个学者。现在，他首先想的是做一个革命者。解放后，他更积极，成天生活在群众中，参加各种运动。一九五〇年五月，云南省军管会派我和他接管昆明各公立图书馆，旋合并为昆明人民图书馆（后改名为云南省图书馆），任命我为馆长，他为副馆长。一年后，他奉调到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先后任研究室主任、处长……等职，为时几达二十年。十年浩劫后，调回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研究室，直至去世。可以说，他的后半生是完全贡献给边疆民族工作了。

他如此热爱民族工作是有其抱负的。当他开始从事这种工作之初，我说：“看来你是决计改行了？”他说：“又改又不改。滇史研究我是不会放弃的。不过我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没有民族社会调查的实践，是不能写出科学的云南历史、中国历史的。只靠古代的文献载籍，必难跳出前人的窠臼。因此我想，花上若干年时间，学习理论，深入调查，然后再重理旧业，让旧瓶里装上新酒。”他这样说，果然这样做了。他和马曜同志分工合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写出了理论、调查、文献三结合的著名论文《从西双版纳看西周》。记得，一九六二年隆冬的一个寒夜，他从白马庙民委会骑自行车到云大宿舍找我。既坐定，取出厚厚的一部稿子（即《从西双版纳看西周》）要我看了提意见。我给

他泡茶，他说：“茶莫泡了，有酒给一杯吧。”于是，我们围炉把酒而谈，尽谈这篇文章，直谈到更深夜阑。两天后我读完稿子，感到太好了，便不待征得他们的同意，送到云南《学术研究》编辑部去。编辑部温剑锋同志看后也极为赞赏。次年遂破例分三期连载。刊出后十五年，即一九七八年十月，长春举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会”，我和他都应邀参加了。会上，不少古史专家得知他是《从西双版纳看西周》的作者之一，都到他下榻处访问交谈。可见这篇论文给人印象之深，影响之远。他因此很受鼓舞，在归途中对我说，现在十年浩劫过去了，有时间有条件可以从事研究了。他打算回昆明后，和马曜同志一起，把那篇文章修改补充，写成一部专著。同时，尘封已久的《南中志校注稿》也该重新董理一下了。从完稿到一九七八年的三十六年间，坊间竟不见有一个注本。看来，董理一番出版还是有必要的。他回昆明以后，真的动手做起来了。哪知翌年春天，忽为二竖所苦。延至六月，竟赍志以歿，多么令人悲痛啊！

目 录

序 例	(1)
引用书目	(2)
参考书目	(3)
附录	(6)
总叙	(14)
牂柯郡	(122)
平夷郡	(135)
夜郎郡	(138)
晋宁郡	(140)
建宁郡	(149)
平乐郡	(162)
朱提郡	(163)
南广郡	(167)
永昌郡	(169)
云南郡	(178)
河阳郡	(183)
梁水郡	(184)
兴古郡	(185)
西平郡	(193)
附：交趾	(195)

《南中志》校注稿

繆鸞和

序 例

《南中志》，晋常璩撰。璩字道将，江原人。成汉李势时，官散骑常侍。璩成《华阳国志》十二卷，《南中志》其一也。是篇于西南史地，载述周贍，搜讨往迹，莫备于此。明顾应祥曾刊于滇，清王崧纂《云南备征志》，亦见采辑。《滇系·典故系一》亦载之，惟仅总叙。历来究心掌故者，多据为典则。其见珍于艺林，由来已久。

惟《常志》经久传钞，讹脱已甚。宋槧即经窜易，弥失本真。明、清诸家广罗众本，详为校勘，差复其旧。按《常志》所依，及其所衍，虽未能备探其源而穷厥流，惟汉、晋以次典籍，有关此土记载者，大都可与比勘；随文引证，有裨考校。又西南故实，《云南备征志》汇录固详，然亦限于专篇，其散见它处者，则未暇辑纂，而断珪碎璧，足资参验者多。每欲掇拾残剩，以备要删，顾兹事体大，仓卒难就。乃先取六朝以前事，以《南中志》为经，有关诸书为纬，网罗遗闻，条举而件系之。如是，则吉光片羽，无虞放失矣。

类聚区分，依违自显，则摭成说，是正异辞；或出己见，妄加臆断，成《南中志校注》一稿。凡例如后：

- 一、是稿意在汇录史料，以资考究，故不厌求详；引诸家所述以辨是非；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凡志所有之事，详其原委；所无之事补其阙佚；所有之人详其生平；所无之人附以同类；所称之地考其今名。
- 二、是稿计分校、注、补、按四项。校文随行写入，余均在正文后低两格写，分别标以〔注〕〔补〕〔按〕诸字，以清眉目。
- 三、西南故实，散见于古籍者甚夥。然有单词片语，虽若可征，未能确然无疑者姑从略。今所汇录，暂以史部诸书为限。
- 四、地处边陲，图书难求。本志仅得商务影印明钱叔宝钞本、清李调元刻《涵海》本、商务排印廖寅刻本数种，不足以言校勘。惟廖校已称精审，金山顾观光复据宋槧，旁引史部诸书、类书等订补之，成《华阳国志校勘记》一书别行于世，语其详贍，无以过之。顾观光（尚之）是书刊于武陵山人遗书。因以李本为主，引廖、顾校语分别注入。偶有与钱本违异者，亦并校之。

引用书目

- 《史记》汉司马迁
《前汉书》汉班固
《后汉书》宋范曄
《三国志》晋陈寿

- 《晋书》唐房乔等
《宋书》梁沈约
《南齐书》梁萧子显
《前汉纪》汉荀悦
《后汉纪》晋袁宏
《续汉书郡国志》晋司马彪撰 梁刘昭注
《晋太康三年地记》晋王隐撰 清毕沅集
《晋书地道记》晋王隐撰 清毕沅集
《水经注》后魏酈道元
《华阳国志》晋常璩
《十六国春秋》魏崔鸿撰 汤球辑
《元经》隋王通经 唐薛收传
《诸葛丞相集》清朱璘编
《北堂书钞》唐虞世南
《艺文类聚》唐欧阳询、令狐德棻等奉敕撰
《太平御览》宋李昉等奉敕撰

参考书目

- 《荀子》周荀况
《商君书》
《韩非子》周韩非
《慎子》周慎到
《吕氏春秋》秦吕不韦
《韩诗外传》汉韩婴

《淮南子》汉刘安
《盐铁论》汉桓宽
《论衡》汉王充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通典》唐杜佑
《通志》宋郑樵
《文献通考》元马端临
《汉书补注》清王先谦
《后汉书集解》清王先谦
《汉书地理志稽疑》清全祖望
《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清陈澧
《补三国疆域志》清洪亮吉
《校补三国疆域志》金兆丰
《晋书地理志新补证》清毕沅
《新校晋书地理志》清方恺
《十六国疆域志》清洪亮吉
《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
《太平环宇记》宋乐史
《广舆图》明罗洪先
《今水经》清黄宗羲
《读史方輿纪要》清顾祖禹
《大清一统志》
《云南通志稿》清阮元等修
《湖南通志》清陈宏谋等修
《广西通志》清金鉷监修

- 《贵州通志》清鄂尔泰监修
《遵义府志》清郑珍
《滇系》清师范
《滇云历年传》清倪蜕
《云南备征志》清王崧
《云南大事记》袁嘉谷
《云南大事记稿》方国瑜
《岭外代答》宋周去非
《黔记》明郭子章
《西事珥》明魏濬
《黔书》清田雯
《续黔书》清张澍
《黔语》清吴振棫
《黔南识略》清爱必达
《蜀中广记》明曹学佺
《滇行纪程》清许纘曾
《滇池考》清全祖望（《鮚埼亭集》）
《贵州水道考》清洪亮吉（《洪北江诗文集》）
《贵州水道考》清晏斯盛
《牂牁丛考》胡翥
《云南濮族考》朱希祖（《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
《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日本藤田丰八著 何健民译
《庄蹻考》方树梅
《庄蹻王滇考》杨志玖（北京大学《治史》杂志第二期）

《三国志诸葛亮传集证》赵西陆（《国文》月刊第十一、二期）

《历代甲子纪元编》清李兆洛

附 录

《晋书》卷一百二十一《载记》第二十一李势：“大司马桓温率水军伐势，……至成都城下，纵火烧其大城诸门。势众惶惧，无复固志，其中书监王嘏、散骑常侍常璩等劝势降”。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九《蜀录四·李势》：“常璩字道将，蜀成都人。少好学，著《华阳国志》十篇，序开国以来迄于李势，皆有条理云”。

《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史·霸史》：“《汉之书》十卷，常璩撰。《华阳国志》十二卷，常璩撰。”

刘知几《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十六国史》：“蜀初号曰成，后改称汉。李势散骑常璩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记李氏兴灭。”

《旧唐书·经籍志乙部史录·伪史类》：“《华阳国志》三卷，常璩撰。《蜀李书》九卷，常璩撰”。

《唐书·艺文志乙部史录·伪史类》：“常璩《华阳国志》十三卷，又《汉之书》十卷，《蜀李书》九卷。”

《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史类·别史类》：“常璩《华阳国志》十卷。”《霸史类》：“常璩《华阳国志》十二卷”。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第二下《史部·伪史类》：“《华阳国志》十二卷，右晋常璩撰。华阳，梁州地也。记汉以来巴蜀人物，吕微仲跋云：汉至晋初四百载间，士女可书四百人，亦可谓盛矣。复自晋至周显德，仅七百岁，而史所记者无几人，忠魂义骨，与尘埃同没，何可胜数？岂不重可叹哉！”

郑樵《通志·艺文略》卷第六十五《史类·霸史》：“《华阳国志》十二卷，晋常璩撰。以巴汉风俗及公孙以后据蜀者各为之志。《汉志书》十卷，常璩撰，《蜀李书》九卷。”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五《杂史类》：“《华阳国志》，二十卷。晋散骑常侍蜀郡常璩道将撰。志巴蜀地理、风俗、人物，及公孙述、刘焉、刘璋、先、后主以及李特等事迹。末卷为序志，云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艺文·杂史》：“《（唐）艺文志乙部·史录》，其类十三……三曰《伪史类》……，《华阳国志》至《三十国春秋》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经籍考》二十七《史·伪史霸史》：“《华阳国志》十二卷。一云二十卷。”

刘知几《史通》卷十《杂述篇》：“史氏流别，殊